

書 評

邵 佳 德*

Michael K. Jerryson and Mark Juergensmeyer, eds.

Buddhist Warfa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xi+257 pages. ISBN 978-0-19-539483-2

關於宗教和暴力（violence）關係的討論，近年來湧現出越來越多的成果，有純理論上的討論，也有很多宗教、教派的個案研究。這其中，對不同宗教的關注度是不同的，對於佛教與暴力的關係問題，通常是較少被關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們對佛教有一個基本的理解——佛教是一個反對暴力、追求和平的宗教。然而在 *Buddhist Warfare* 一書的編作者看來，這種對於佛教的理解更多的只是一種想像。按照編者麥克爾·傑瑞森（Michael Jerryson）在 *Buddhist Warfare* 導言中所說，編撰本書的主要動機就是為了打破對於「佛教是絕對和平主義的宗教」的社會想像。（頁 3）

當然，在本書出版之前，也有一些學者就此話題做過相關的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從佛教經典的角度討論佛教對暴力的態度，以及從佛陀或佛教徒實踐的角度作歷史個案的探討，其中後者居多。涉及的

2013 年 1 月 7 日收稿，2013 年 2 月 27 日修訂完成，2013 年 5 月 20 日通過刊登。

* 作者係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所博士生。

Shao Jiade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地域主要是南亞、日本及西藏，都有專書研究。¹將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個案放在一個共同的主題下進行集中討論的研究，尚不多見。用專書進行的個案研究，固然可以更深入細緻地討論，但是卻也缺少比較的視野，難以窺見更普遍性的內容。而本書的研究可以提供更寬廣的視角，並通過時空因素更有力地證明佛教與暴力間千絲萬縷的關係。本書之前，尚有一本類似的論文集，由邁克爾·齊默爾曼（Michael Zimmermann）等主編的 *Buddhism and Violence*。各篇論文之間以「暴力」作為線索編纂成冊，涉及的內容稍顯寬泛。²而本書則更為集中地討論了「暴力」最極端的形式——戰爭，及其與佛教的關係。

本書由八篇研究論文、一篇導言和一篇餘論組成，通過歷史研究、文本分析、在地調查等方法，內容涉及東亞中、日、韓三國佛教與戰爭的歷史概述，原始經典對佛教對於戰爭及懲戒的看法，西藏和蒙古佛教合理化戰爭和刑罰的過程，中日戰爭和朝鮮戰爭中日本僧人和中國僧人的參與，斯里蘭卡僧人對士兵的佈道，泰國佛教和寺院的軍事化等問題。從時間上看，橫跨印度原始佛教時期到五、六世紀的早期漢傳佛教，再到當代南亞近況；從空間上看，包含了印度佛教、藏傳佛教、漢傳佛教、日韓東亞佛教和南傳佛教；從主題上看，囊括了經典教義的討論和具體個案的歷史研究。因此在佛

1 主要的研究區域集中在亞洲，近五年多來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Mikael S. Adolphson, *The Teeth and Claws of the Buddha: Monastic Warriors and Sōhei in Japanese Histor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Michael I. Como, *Shōtoku: Ethnicity, Ritual, and Violence in the Japanese Buddhist Trad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Michael K. Jerryson, *Buddhist Fury: Religion and Violence in Southern Thai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Mahinda Deegalle, ed., *Buddhism, Conflict and Violence in Modern Sri Lanka*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Jacob P. Dalton, *The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Xue Yu (學愚), *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 1931-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2 Michael Zimmermann, ed., *Buddhism and Violence* (Lumbini: Lumbini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6). 此書包含八篇論文，涉及佛教的自殺觀、善意的惡僧與寺院暴力的義理根據、在瀆聖與神聖之間的解脫概念、藏傳佛教傳統中關於「慈悲殺生與解決衝突」的倫理討論、鈴木大拙與日本軍國主義的關係、傳統日本佛教與動物的宰殺、佛教對於國法中的刑法問題的態度等。

教與戰爭的話題上，有著較強的代表性。筆者認為，本書的各篇論文之間雖然沒有太多具體的歷史聯繫，但是合成一書，卻正好展示了「不同佛教」(Buddhisms)所共享的一些特性。

第一章是戴密微(Paul Demieville)在1957年舊文的英譯，這是較早討論佛教與戰爭主題的研究。作者從中、日、韓三國的佛教歷史中找到了許多涉及戰爭的案例，並分析了佛教徒為自己參與戰爭或暴動辯護的理由(justification)。第二章中，Stephen Jenkins討論了 *Ārya-Bodhisattva-gocara-upayaṇiṣaya-vikurvaṇa-nirdeśa Sūtra* 這部經典，從中可以看到暴力及戰爭在佛陀時代就與佛教有牽扯，尤其在君王治國時，佛教認可一定條件下的暴力運用。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別討論了十七世紀時的五世達賴喇嘛和十六世紀的蒙古可汗如何運用暴力獲取權力，以及如何將暴力和戰爭的運用合理化，以保護和表達其自身的權力。第五章是對於日本的討論，作者分析了禪的思想如何與日本國家利益及天皇崇拜相結合並助成戰爭。Brian Daizen Victoria 是此領域的專家，他立場鮮明地認為日本的這種對於禪的理解違反了佛法的真義。學愚在第六章中討論了新中國成立初期，佛教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如何通過積極參與朝鮮戰爭而調和適應新政權，作者進而認為，愛國主義在此時幾乎成爲一種新的宗教。第七章的焦點在當代斯里蘭卡的佛教戰士和僧人，作者 Daniel W. Kent 並沒有關注佛教對於參與戰爭的辯護，而是通過訪問調查來關注佛教徒如何理解他們在戰場的暴力行爲，以及他們所關心的業報等問題。最後一章中，Michael Jerryson 通過在泰國的田野調查，討論了當代泰國僧人及寺廟的軍事化問題，認為佛教的武裝化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僧人，同時也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除了具體的個案研究，導言和餘論也相當重要。導言中 Michael Jerryson 討論並初步界定本書中所用的「佛教」(Buddhism)、「戰爭」(war)、「暴力」(violence)等詞彙，他認為佛教從最早期開始，爲了獲得政治上的支持，就沒有持守一個完全反對戰爭的立場，它始終要在保持自我立場和適應既存政權之間作出權衡。(頁10-11)而伯納德·佛爾(Bernard Faure)的餘論則總結了全書，並作出了精要的評論，極具啓發性。他在其中提出的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是：暴力對於佛教來說，是語境化(contextual)的，還是內在固有(intrinsic)的？(頁219)

本書有幾個值得注意的優點。首先，我們幾乎從所有的佛教傳統中，都找到了它們參與、甚至發動戰爭的理由，以及戰後對此行為的辯護。總結起來大概有以下幾種辯護方式：佛教認為生是苦的，因此殺死一個人其實是幫助其解脫苦海；佛教講求「空」的教義，萬物包括人都是因緣和合而生，因此從根本上說，不存在被殺的人，也不存在殺人者、殺人的武器等等；「慈悲殺生」，即為了顯示對多數人的慈悲，被迫殺死少數惡人是允許的，因為這些人也被認為是阻礙佛法傳揚的「魔」（Mara）。對於這種殺戮也可以從真俗不二的教義來理解，俗諦意義上的殺戮並不妨礙真諦的獲得，有時甚至還是功德無量的。當然，當你被迫拿起屠刀時，你的內在意圖（intention）必須是慈悲的。這些理由分別從佛教「苦」、「空」、「慈悲」、「真俗」或是信徒護教立場來為佛教捲入戰爭作辯護，並且我們幾乎可以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傳統中都找到類似的說法。

當然，本書所展示的也並非全然是這種相似性，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不同佛教傳統中與戰爭產生關係的不同方式。比如同樣是在中日戰爭（1937-1945）中，日本僧人和中國僧人的參與就建立在不同的理論傳統和具體實踐上，由此同樣是佛弟子，卻又同時可以把對方當成是反佛的魔道。³ 比如在近代中國，佛教徒必須學會與共產黨的政權合作，從而獲得生存空間，而泰國的僧人卻可以把共產主義作為佛法的敵人。（頁 189）又如，當代斯里蘭卡作為一個佛教國家，與其他佛教完全處在政權掌控下的地區相比，僧人和信徒的關係又有特殊性。而西藏和蒙古的佛教，在面對苯教或者佛教中不同派別的爭鬥時，又必然與斯里蘭卡佛教徒面對印度教徒、泰國佛教徒面對伊斯蘭教徒有所區別，等等。總之，雖然這些案例都與佛教和戰爭相關，但它們又各自受到不同的政治、種族、經濟等外在因素的影響，因而與暴力發生關係的方式就變得各不相同。

這就又把我們拉回到了 Bernard Faure 提出的問題，佛教之所以與暴力和戰爭發生了千絲萬縷的關係，似乎並不是因為佛教提倡暴力，崇尚戰爭，而是在面對佛教以外的政治、種族等因素時不得不作出的回應，亦即佛教暴力

3 關於中國佛教徒在中日戰爭中的參與，可參見 Xue Yu, *Buddhism, War,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Monk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Japan, 1931-1945*.

是有其社會語境的，而非教義內生的。據此我們似乎仍可以說，佛教是一個崇尚和平的宗教，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Faure 曾在餘論中簡要地指出，有很多因素讓人們不太願意承認佛教是一個暴力的宗教，但我們並非找不到支持這種觀點的論據。比如我們可以看到早期佛教在對待女性的態度上，並非與對待男性一視同仁；比如在佛教的藉以超脫的儀式中、在禁欲主義的寺院生活中，也可找到暴力的結構。（頁 222）當然，這樣的分析很多是建立在現代學者的暴力理論上，不一定能同情地理解佛教的立場，不過這仍是當代佛教不得不面對和回應的問題。

所以，這本論文集除提供不同佛教傳統中的經典案例之外，還進一步引導我們在理論上對於佛教與暴力的問題進行深思，Faure 提出的問題和建議的思路，是關注此領域的學者可以繼續深入探討的。

當然，此書也還存在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地方。除了提供具體的案例，我們可以繼續深究佛教為何捲入戰爭，並試著設想今後佛教面對衝突時，應當如何處理。這需要我們一方面更多關注佛陀、佛法對這些問題的根本看法，同時也要尋求實踐中最適宜的解決方法。佛教教義雖然諸多提倡和平的觀點，但真正在面對衝突時卻也只能以暴制暴。我們可以嘗試發問：這樣的方法是否是最好的或唯一的？是否有通過和平達到和平的路徑（a peaceful approach towards peace）？另外，在分析了各個傳統的佛教事例後，我們有無可能汲取不同地區的經驗來處理現實問題？誠然，本書的目的是破除在大多數人心中存在的佛教幻象，但我們也不得不思考，擁有那麼多和平思想資源的佛教，可否為我們紛爭的世界提供戰爭以外的路徑？

此外，在對「佛教」的定義問題上，本書採取了較為寬泛的標準，以儘量容納各種不同的傳統。本來對於「佛教」一詞的定義可以見仁見智，但是當我們要回答「佛教是否是和平的宗教」這一問題時，我們就必須對「佛教」作出一個界定。不僅僅要回答不同地區的佛教傳統是否可以統稱佛教，還要回應捲入戰爭的佛教是否仍可稱為佛教。這不僅是本書要處理的棘手問題，也是其他佛教研究中會遇到的問題。雖然有學者認為，像「宗教」、「佛教」這樣的概念都是「第二序」（second-order）的，更大程度是出於學者研

究和學科建立的需求，⁴亦即對普通信仰者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定義問題，而是其自身的信仰方式和生存狀態。但是即便如此，每個信仰者對於什麼是佛教及其教導的認識，仍然是左右他們信仰和實踐的要素。在這個意義上，信仰者對於佛教是否主張和平、是否可以容納暴力的認識，實際是會影響到他們的宗教實踐。因此，學者對於佛教與暴力的研究，表面上看似乎是僅具學院內純粹的學理意義，實際卻可影響到信眾的信仰和實踐，從而對學術外的真正的宗教行為產生作用。所以，在這個宗教同暴力的聯繫越來越顯著，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與恐怖主義（terrorism）日漸受到重視的時代，進一步研究佛教與暴力、戰爭的關係，無疑是具有重要的意義。

4 Jonathan Z. Smith, “‘Religion’ and ‘Religious Studies’: No Difference At All,” *Soundings* 71(1988): 233.